

上册
中册
下册

广东省

优秀统计分析报告选编

1999—2007

广东省统计局



1999—2007

广东省
优秀统计
分析报告
选编

广东省优秀统计分析报告选编

(1999 - 2007 年)

(上册)

广东省统计局编

二〇〇八年四月

《广东省优秀统计分析报告选编（1999 - 2007 年）》

编辑工作人员

主 编： 幸晓维

副 主 编： 欧卫东 彭启鹏 林万洲 刘永成 罗 永

编辑部主任： 邱 俊 钟森宏

编辑部副主任： 杨慧芳 王文森 马建强

责 任 编 辑： 曾文棣

编辑工作人员： 郭华溢 李琳燕 邹志敏

编者说明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是统计的基本任务之一。近十年来，各级统计部门精心组织，统计人员用心血和汗水凝成一篇篇统计报告，可供各级统计人员互相借鉴、共同提高。这里，我们精选了1999-2007年度各级统计局部分获奖统计分析报告，编成《广东省优秀统计分析报告选编（1999-2007年）》，并附录2006-2007年度全国部分优秀统计分析报告。

《选编》分上中下三册，上册编入1999-2002年度省统计局获一、二等奖优秀统计分析报告；中册编入2003-2007年度省统计局获一、二等奖优秀统计分析报告；下册编入1999-2007年度全省市、县（区）统计局获一等奖优秀统计分析报告并附录2006-2007年度全国获一等奖优秀统计分析报告。这些报告能围绕各阶段各级党政领导关心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展开分析，充分利用各种统计资料和相关信息，以进度分析、专题分析、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运用各种现代分析方法和技巧，比较客观、准确地揭示了社会经济运行态势和发展规律，为各级党政领导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和大量有价值的咨询意见。许多认识、观点和建议被决策部门采纳，不少文章还被刊在国家和省级各种刊物上。

限于篇幅，我们对一些人编文章的内容和图表做了删节。为统一编排格式，也对一些文章的体例进行了调整，不妥之处，敬请作者与广大读者见谅。

2008年4月

目 录

1999 年度广东省统计局优秀统计分析报告

通货紧缩与经济断层	卜新民 黄德发	3
恰在潮落潮起间		
——近年来广东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态势分析	欧卫东	15
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 奋起拼搏 迎接挑战		
——对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条件和制约因素的分析与建议	欧卫东	25
改革开放二十年 人民生活奔小康	叶健夫 汪国新	33
1998 年宏观经济景气状况、走势及调控	苏华宏	39
加大更改力度 回应新世纪的呼唤		
——广东工业企业更新改造投资情况专项调查分析报告	秦定坚 欧卫东	45
1998 年广东经济的回顾与展望	陈铭津 黄德发	54
广东工业废水分析及环保思考	陈 跃	59
广东“三资”工业企业效益比较分析及增效对策探讨	幸晓维	69
对目前广东农村工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的分析及建议	欧卫东 丁 宪 梁瑞峰	76
重塑机制 再造辉煌		
——广东乡镇企业增创新优势的战略思考	黄德发	80
买方市场下的“卖方”		
——关于多管齐下开拓广货销售市场的分析和建议	李更明	89
广东农村消费品市场变化及发展趋势	陈建贤 罗凤金	93
广东北部山区农户经营行为研究	董家斌	104

2000 年度广东省统计局优秀统计分析报告

对广东开放水平的测度与研判	课题组	113
优化结构是当务之急		

——从 1997 年投入产出表解读的广东经济	卜新民 欧卫东 王国伟等	125
坚持效率优先 关注社会公平		
——对广东收入分配状况的分析	专题组	131
广东经济增长放缓与当前走势的宏观分析	卜新民	135
控制人口增长 为广东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叶健夫 黄春红	140
客观审视 群策群力 为提升广东产业结构而努力		
——广东产业结构问题研究	张汉昌	147
宏观景气回升 总体态势趋好		
——1999 年广东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课题组	158
2000 年广东经济形势展望	课题组	162
“九五”以来广东工业经济结构发生可喜变化	幸晓维 黄平光	167
伟大的实践 历史的巨变	欧卫东 李更明	172
立足市场 以农为本 构筑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新机制		
——对 1998 年我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调查分析与思考	欧卫东	181
广东农村消费品市场变化与农民消费	陈建贤	188
1999 年我省不同收入层次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差异分析	于丽波	197
广东省“提高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情况调查简析	陈旭阳	204
价格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刘寿生	206
突破“新瓶颈”制约		
——关于加快广东第三产业优化的分析和建议	李更明	212

2001 年度广东省统计局优秀统计分析报告

创新珠三角

——兼与长江三角洲比较研究	课题组	219
劳动力集聚与广东城市化道路的抉择	课题组	241
对广东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认识	卜新民	263
国际油价飙升对广东经济的影响	专题组	268
1999 年广东最大 50 家企业分析	欧卫东	275
“九五”回眸与“十五”前瞻	课题组	281
2000 年广东经济形势及 2001 年运行趋势分析	专题组	293

广东城镇贫困居民生活现状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林壮光 徐汉松 陈瑞光	300
中小企业稳步发展 微观经济问题尚在		
——广东省 200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现状简析	丁 宪 宋社和	308
2000 年广东宏观经济景气分析	马建强	314
构筑工业化的里程碑		
——“九五”时期广东工业经济发展成就	邱 俊 王文森	319
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叶建新 陈春华	324
增收：农民的期望	赖国扬	330
广东物价突破负增长的基本判断	刘寿生 陈瑞光 蓝品良等	336
2000 年我省企业景气指数稳步上升	刘 克	340
我省出口面临严峻形势	陆定国	343

2002 年度广东省统计局优秀统计分析报告

浴火催生 增创辉煌

——广东产业国际竞争力研析	专题组	351
世界经济景气减缩与广东反周期对策	专题组	371
广东农业产业化经营现状分析	叶建新	379
我省农村多孩生育问题仍较严重	彭启鹏 马 建	385
正确把握 防范未然		
——对近两年广东税负问题的调查、分析和认识	欧卫东	389
广东省活力型中小工业企业发展研究报告	邱 俊 杨 凡 林 瑜等	394
广东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江浙两省的比较分析	专题组	403
《广东省妇女发展规划（1996—2000 年）》终期监测评估报告	曾文棣	408
广东省第三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钟剑虹	420
广东农村劳务经济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初步研究	赖国扬 黄 丹	425
企业税务负担“轻”还是“重”		
——对广东 60 家企业集团（公司）的税务负情况调查简析	丁 宪 黄 晖	438
广东城镇居民对今年收入与消费预期的调查报告	丁丽波	442
宏观经济稳定 投资信心增强		
——2001 年广东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分析	陆定国 洪秀霞	447

1999 年度广东省统计局 优秀统计分析报告

通货紧缩与经济断层

——广东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卜新民 黄德发

在由工业化中期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关键时期，广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日趋凸现和显性化，通货紧缩和经济“断层”趋势逐步加深，引发经济“大调整”。在跨世纪的征程上，广东如何突破传统经济的樊篱和窠臼，摆脱现实的困境，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引导和促进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值得关注。

通货紧缩：经济陷入大调整的表征

长期以来，对于世界上多数国家来说一个可怕的怪物就是通货膨胀，现在却要直面其反面的挑战：价格和经济增长的收缩，世界经济正小心翼翼地走在通货紧缩陡坡的边缘。何谓通货紧缩？按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和斯蒂格里茨的定义，它是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自 1930 年以来，世界首次进入了以消费价格下跌为标志的通货紧缩的阶段。首先是原材料价格的突降，然后从 1997 年开始石油价格又猛跌了近一半，在过去两年中英国《经济学家》工业品价格指数也跌去 30%，达到指数公布以来一个世纪中的最低点。全球的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之间的产出差（OutputGap）达到 30 年代以来的最大值。

在全球生产过剩和物价下跌的大背景下，广东也发生了通货紧缩，且呈加速之势，经济陷入大调整之中。

其一，物价总水平不断回落，商品和服务价格不断下降，并超过了资本价格的下降幅度，导致了内生性通货紧缩。全省物价指数涨幅自 1994 年达到本轮经济景气扩张期的最高点之后逐步回落，1997 年 9 月以来，广东零售价格已连续 20 多个月呈下降状态，1998 年全省零售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分别比上年下降 3% 和 1.8%，今年以来物价仍然沿续了去年的走势。生产资料价格和农资价格也处于全面下降状态。1995 年全省主要物资销售价格总指数比上年下降 3.6%，其中线材下降 14.9%，水泥下降 10.2%，此后愈降愈烈，至 1998 年，主要物资销售价格总指数比上年下降 11.0%。物价总水平的长时间持续下降，表明通货紧缩不仅已经来临，而且呈不断加深之势。尽管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一降再降，但由于同期物价水平回落幅度更大，致使实际利率水平仍然较高，企业的实际利息负担接近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一方面企业负担继续上升而投资下降，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加深而导致总需求下降。

其二，贷款增速放缓，货币供应量增长呈逐步

编者注：本文获 1999 年度国家统计局优秀统计分析报告一等奖，1999 年度广东省统计局优秀统计分析报告一等奖。

萎缩之势，货币流动性不断降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由 1992 年增长 31.7% 逐年回落到 1998 年的 15.9%，下挫近 16 个百分点，表明储蓄倾向增强，消费和投资预期下降。1998 年末，全省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比上年同期增长 18.6%，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 12.9%，现金流通量(M0)增长 10.9%，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幅回落 6.2、6.7 和 16.1 个百分点，这与全省 GDP 的增速回落和物价持续负增长是相吻合的。全省的货币流动性近年来也一直保持减缓的趋势，从 1996 年末的 42.0% 下降到 1997 年末的 40.3%，1998 年末则为 38.3%。货币结构流动性的下滑，反映出经济不景气，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极低，而利率水平较高，经济生活中有利可图的机会减少，企业乐意把钱存入银行。货币供应增速和结构流动性下降，也反映出经济中通货紧缩的程度加剧。

其三，市场需求自我收缩机制逐步形成，最终需求增长明显乏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力不足，企业经济效益不理想。在“双紧”政策的宏观调控大环境下，广东的投资增长率由 1992 年 92.8% 的历史巅峰逐步回落至 1995 年的 8.7%，1996 年则为零增长，1997 年下降 1.4%。前后落差之大，令人惊讶。1998 年政府加大了投资力度，全年投资增长 16.1%，出现恢复性增长。但由于积重难返，民间投资依然缺乏积极性，显示政府投资的带动、示范效应不明显，导致投资中转化为消费资料的需求减小，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大。目前政府消费缩减并向规范化方向转变，社会集体消费逐步转变为个人或家庭自主消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趋缓、都对即期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明显影响，以致消费对 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1997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实际下降 0.3%，与 1992 年相比落差达 10.6 个百分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则下降 1.4 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实际增长 0.3%，增幅比 1992 年回落 8.5

个百分点，农民边际消费倾向则下降 5.6 个百分点；1992 - 1997 年全省人均消费年增长率由 18.3% 回落到 4.8%，最终消费率由 57.3% 回落到 56.2%。前几年广东的消费市场处于一种“超稳定”结构，但增幅呈逐渐回落的态势，即期消费不甚理想，旺季不旺、淡季偏淡的特征非常明显，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 1993 年的 39.3% 回落到 1998 的 11.3%。由于投资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降低，经济的较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外需求保持高增长。但 1998 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外贸出口增幅锐减，全年外贸出口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一般贸易出口自 1997 年 10 月以来就每况愈下，国外需求严重萎缩。

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企业订货不足，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经济效益滑坡。伴随工业增长速度的回落，“速度型效益”特征明显，企业经济效益随之下滑。从 1993 年至 1998 年，全省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税由 18.9 元降至 8.9 元，资金利税率由 10.9% 元降至 5.8%，产值利税率由 9.7% 降至 6.4%，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税由 10.1 元降至 6.7 元。企业亏损问题仍较突出，1998 年企业亏损面达 31.1%，比上年扩大 2.6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下降 14.7%，亏损额上升 13.8%，企业经营的困难程度进一步加深。

其四，失业下岗人员压力加大，城镇贫困家庭明显增多。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在短期内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即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低；反之，通货膨胀率越低，失业率越高。近年来广东经济增速持续减缓，通货膨胀压力逐步消失，加之各项改革不断推向深入，企业减员增效力度加大，个体工商户关门歇业增多，失业下岗人员呈不断扩大之势。1998 年末，全省城镇职工下岗总数为 22.67 万人，失业人员达 26.24 万人。目前失业下岗人员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贫困人员群体，他们月收入偏

低，大部分人的医疗福利没有保障。在失业不断加剧和社会保障体系脆弱的情况下，失业下岗人员物质和心态的双重失衡有可能引发局部的社会风险。

其五，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经济活力不足，景气度不高。在全国经济走势明显互动的情况下，广东经济自 1991 年重新启动后，旋即进入了一个超高速增长时期，1992 年和 1993 年全省 GDP 比上年分别增长 22.1% 和 22.3%。经济高速增长导致高通胀，1994 年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上涨 18.9% 和 21.7%；房地产、开发区、股票等炙手可热，经济“泡沫”膨胀。从 1993 年 7 月开始，中央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加强宏观调控，广东经济增幅逐渐步入下降通道。至 1998 年，全省 GDP 增长 10.8%，1999 年的预期目标为 8.5%，比 1994 年的 GDP 增幅下挫 62%。

从经济周期的历史透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波动频繁，稳定性不高，不稳定系数过 4.148，比日本、韩国、台湾高 2 倍左右。目前已完整地发生了三次周期性波动，即 1978—1983 年为第一周期，1983—1986 年为第二周期，1986—1990 年为第三周期，三次周期的波幅分别为 0.049、0.0399、0.0454，波动系数分别为 4.49%、3.52%、3.98%。本轮经济循环自 1991 年开始，1994 年达到峰顶，此后开始收缩，但谷底在何处尚难以测定。波幅和波动系数分别为 0.0511 和 4.45%，显示波动有所加剧。其显著特点一是呈“高位——平缓型”波动，谷底逐步抬高；二是经济波动的性质从政府推动的计划周期转向市场经济决策的商业周期；三是波长明显延伸，波动周期和景气收缩期分别已经达 9 年和 5 年，均为历史最长，短周期波动对此已无法解释，一些长期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波周期发展趋势明显，经济正陷入大调整之中。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显示，广东宏观经济景气近年来在振荡中逐年走低，1998 年经济仍处于偏冷状态，经济大调整的色彩

浓厚。

通货紧缩是一柄双刃剑。在古典经济增长阶段，通缩通常伴随经济衰退。在政府干预、技术和知识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大为提高的现代增长阶段，通货紧缩可能和较高的经济增长一同产生。对于经济建立在以知识为基础上的发达国家而言，无通货膨胀时代也许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黄金地带”，但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通货紧缩并不是一幅完全美丽的图画。尽管人们享受到价廉物美的实惠，但通缩直接导致企业“惜投”、居民“惜购”、银行“惜贷”，制约了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经济断层：广东经济大调整的症结

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全般为 20 年左右，广东的快速增长期也持续了近 20 年。当前广东经济转型出现“短路循环”和“青黄不接”，既有经济波动的因素，也有宏观调控的影响，还有亚洲金融危机的传导作用，但这些都是外部诱因，从内因上讲，断层加剧才是经济大调整和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这是由经济成长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个阶段的升级期所形成的特殊机理决定的，在进入新的经济成长阶段之前，新旧产业、技术、增长方式、管理模式、体制之间发生磨擦，演化成“断层危机”。

（一）产业结构性矛盾与结构断层。从 90 年代以来的情况看，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广东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最尖锐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生产结构与资源结构的矛盾。全省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严重，结构明显趋同，引致内部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问题突出。据第三次工业普查，全省有 204 种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约占被调查产品的 1/3。在具有明显的资源指向

型、粗放型特征的生产结构状态下,一方面导致经济低效运行,总增加值率几乎呈直线下降的趋势,1997 年为 32.6%,比 1987 年下降 12.5 个百分点,说明向社会提供的最终使用的产品与劳务相对减少;投资效果系数由 1980 的 1.053 回落到 1998 年的 0.274,投资的边际效应下降。另一方面资源紧缺约束则日趋强化。1978 年全省物耗率为 54.1%,到 1997 年上升至 67.4%;全省人均耕地已从 50 年代的 1.5 亩降到 0.5 亩左右,约相当于全国的 1/2,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突出。

二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位的矛盾。目前已经出现的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局面是在居民收入和消费都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产品供求结构不合理、特别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大量依赖进口的情况下出现的,基础并不巩固,有些产品和服务项目的缺口仍比较大,如部分基础产品、公共设施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国内市场上的电子信息、精细化工、饮料、成套设备、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有 50% 以上依赖进口,表明有效供给不足。

三是企业的组织结构的不合理与增长方式转换的矛盾。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组织呈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生产要素愈来愈集中于专业化大型企业;二是生产要素向为大企业协作配套的小企业扩散。就广东而言,企业之间缺乏协作配套,产业关联度较低。在工业化国家,机械制造业通用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比重平均高达 80-85%,铸锻件工艺专业化生产比重达 90%,而我省均在 20% 以下;企业规模偏小,大型企业仅占 1.4%,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差,技术开发的扩张能力严重弱化。同时存量结构调整始终是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大量长期资不抵债的企业“垂而不死”,违反了自然淘汰规律,阻碍了优势企业的扩张和新生代企业的崛起。

四是技术结构滞后与产业升级的矛盾。总体来讲,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仍然相当幼稚,国民经济的

整体素质和技术含量不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约为 40% 左右,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仅为 0.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 1997 年投入产出分析,工业八大支柱产业部门中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部门的产出仅占支柱产业部门产出的 30.1%,占全部工业总产出的 21.0%,整个工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结构。由于受到人才、技术、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梗阻”,导致广东产业优势弱化。

(二)“投资无热点”与投资断层。在经济大调整当中,广东的投资呈大起大落的走势,“投资无热点”现象日渐明显。首先,制造业领域投资受到限制。80 年代广东大力推进轻型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在“七五”时期,家电工业迅速崛起,并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先发优势明显。其间,全省制造业投资年均递增 15.1% “八五”时期,制造业投资仍保持快速增长,年均递增 30.8%。与此同时,广东原有特殊政策的“孤岛效应”、资金的“漏斗效应”、长期被压抑能量的“喷井效应”等宏观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内地省份迅速迎头赶上,制造业领域已出现结构性过剩,市场销售难度加大,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 2620 种产品中,销售率在八成以下的有 570 种,占 21.8%。表明制造业投资空间已不大,投资下降已成必然,1998 年制造业投资比 1995 年下降 13.4%。

其次,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出现间歇期。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广东开始着手解决基础建设滞后于加工工业发展造成“瓶颈”的矛盾。“八五”时期,广东投入基础建设的资金是各历史时期中最多的,累计达 2137 亿元,比“七五”增长 3.7 倍,由于投入幅度增加,“瓶颈”约束大为缓解,能源供应出现相对过剩。1995、1996、1997 年全省能源投资分别比 1994 年下降 39.0%、

45.2%、29.0%；1996、1997年原材料投资分别比1995年下降15.0%、68.9%；1997年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投资则比1996年下降15.1%，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疲态尽显。

第三，房地产开发业短期尚无法恢复元气。“八五”时期广东房地产开发行业投资出现过度膨胀，累计投资1459.87亿元，年均递增76.7%，比工业投资增长快45.9个百分点。但由于房价太高而超过居民承受能力的合理范围，住宅消费受到了极大抑制，导致大量商品房因滞销而积压，大量资金被套牢，全省沉淀在房地产开发上的资金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1996、1997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比1995年下降6.2%、6.3%，房地产业元气大伤。

在传统投资领域出现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新的投资热尚未形成，投资市场的疲软在所难免。

（三）消费升级与消费断层。在计划经济时期，资源的短缺性特征明显。绝大多数商品供不应求，生产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心环节，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扩张生产、增加供给，另一方面则是抑制需求，防止过热和通胀，整个国民经济属于生产导向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的发展和供求状况的改善，解决生产过剩——消费需求不足演变成宏观调控的永恒主题，国民经济的消费型特征凸现。经过近20年高速增长的数量积累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生产和供给能力大大提高，买方市场开始出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从城镇市场到农村市场，99%以上的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状态，市场消费的排浪式、热点型现象销声匿迹，消费主导型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在消费升级的关键时刻，国内“市场分层化”受阻，广东经济发展出现了消费断层。

其一，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出现阻滞。当前广东城镇居民消费正由传统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向新型电

子及十万元级商品转，传统家电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空调已基本普及，家庭普及率分别达到119.1%、99.2%、78.2%、330.1%和63.7%，但家庭影碟机、录放像机、家用电脑、组合音响、摄像机、微波炉等电子产品的普及率分别只有24.3%、37.8%、9.1%、39.7%、2.2%和10.4%，家庭用汽车的普及率只有0.3%。居民消费升级转换滞缓，根子在于消费障碍，即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存在一些不利于消费或阻碍潜在消费需求实现的因素，如消费基础条件、消费政策、流通体制、社会福利形式、消费观念、消费信贷、心理预期等等。从政策面看，住房分配制度不合理，二、三级市场未能放开，住房建设、消费、租赁、转让等循环不畅；商品房开发建设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造成户价居高不下；消费信贷发展滞后，期限偏短；对私人购买小车的限制和高昂的养护费用，遏制了家庭用汽车的增长。从心理预期看，当前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养老保险、子女教育、企业减员增效和政府机构人员的精减改革等均已给城镇居民造成巨大的压力，直接导致心理预期暗淡，消费支出预期下降。从消费习惯看，中华民族素以节俭为美德，养成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这一状况在目前生产信贷过份超前、消费信贷严重滞后的合力作用下，一方面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限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

其二，农村市场低迷。农村市场地位的下降缘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消费断层问题。无论是收入水平、消费档次，还是消费构成，城乡差距至少在10—15年，正好相差一个消费级。1998年末，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5倍，二者的差额是1980年的26.8倍，差距愈拉愈大；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相当于城镇的39.5%，比1990年下降6.4个百分点。当城镇居民进入新的消费升级准备阶段时，农村居民未能及时填补市场空白。农村除自行车、缝纫机、手

表、电风扇、收录机、液化气灶具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较高外，其余均低于 50%，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的普及率分别为 46.1%、18.9%、9.9%。农民的消费障碍主要是消费基础条件落后。一方面是近年来农民增产不增收，收入增长低迷，而农村乱收费有禁不止，支出水平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农村电力设施不足、电力供应质量差、用电成本高、自来水普及率低，必然阻碍农村家用电器市场的开发。

（四）经济体制转型与体制断层。广东正处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高度集中、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坚冰已被打破，但旧体制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型已初步形成，但仍残留着诸多计划经济的痕迹和烙印，并正在明显地制约甚至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广东在改革方面步履蹒跚，常常“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显峥嵘。从全国范围看，广东在体制上的绝对优势已变为相对优势，部分优势甚至消失，改革释放的能量大大趋弱。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旧体制的阴霾不散，而新体制的曙光时隐时现，出现体制真空，给人以“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感觉。

首先，政企分开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政企关系的“管死”“放乱”死节难以理顺。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主要还是运用行政手段对国有企业实行直接的、微观的管理，行政干预使企业在转换机制、经营者的选择、资产流动重组和法人财产权落实等遇到很大困难，出现“一管就死”的局面，也易于导致政府管理人滋生腐败。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公司制改造进展不快，全省企业法人中股份制企业数目仅占 2% 左右，而且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企业优胜劣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职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升能降的机制还未形成。政府如果全面放开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就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扩大，出现“一放就乱”

的局面。不从体制上根本解开“管死”“放乱”这一死节，政企分开将成为一句空话。

其次，所有制结构调整“一山放出一山拦”。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初步形成了“多轮并转”的格局。但国有资本过于分散、行业覆盖面广的问题还远未解决。在全省 835 个行业小类中，国有经济涉及的行业有 744 个，覆盖面达 89.1%。国有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竞争力差，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机制还没有形成。同时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扶持不够，管理服务跟不上，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尚未形成。

第三，要素市场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发育缓慢，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低，国有银行商业化道路任重道远；产权界定不明，产权市场尚未形成；市场秩序混乱，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管不力。社会保障体系远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国有企业参保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无法满足企业改革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第四，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尚未确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计划经济的方式和办法，主要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没有形成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货币财政 政策双失效的反思

由于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缺失，近年来实施货币财政政策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值得反思。

（一）宏观调控的盲点：货币财政政策的双失效。针对经济领域存在的疲软苗头，中央在金融货币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先后 6 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其中 1998 年全年新增贷款 11491

亿元，为历史最多的一年，但这些措施对于刺激投资和消费、启动经济而言，效果不太明显。于是中央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据不完全统计，1998 年中央政府共发行国债 6150 亿元，创历史最高记录。除了直接导致国家投资大幅度增长外，其实际效果仍旧欠佳，未能遏止经济增速下滑的势头。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双“失效”，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主观失误。

第一，“流动性陷阱”效应显现。“流动性陷阱”的内涵包括：①经济处于严重的萧条之中，名义利率已下降为零或接近为零。②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名义利率的进一步下降已失去作用，因为名义利率不能为负。③由此利率对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回升也失去了杠杆作用。按照传统凯恩斯主义观点，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时，货币政策不起作用，只有靠财政来启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则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主张采用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即大量印制钞票，造成一个长达 15 年之久的、4% 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实际利率为负，来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中国的情况与经典式的“流动性陷阱”尚有差别，但趋势性相近，因此，“流动性陷阱”是中国货币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实践操作上的失误。中国的宏观调控长期以货币政策为主，1998 年虽然采取了空前的财政手段，但由于操作上出现失误，南辕北辙的政策必然带来相互抵消的效果。增支和减税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二者不可偏废。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却出现部分企业贷款交税的怪现象。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滑，但财政收入却保持高速增长。1998 年全国财政增收 1003 亿元，增长 15.9%，快于 GNP 增长 1 倍多；广东的财政收入增长 14.9%，比当年 GDP 增速快 4.8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实际税率的提高，它直接降低了财政支出扩张的乘数效应。

第三，政府投资的局限性决定了投资效率低

下。从投资理论看，政府投资组合般一般遵循“哑铃”模式，即投资集中于“低风险低收益”和“高风险高回报”的两级，减少“哑铃”长长的手柄——加工工业的投资。但财政投资的局限性较明显：一是重复建设。广东的公路、电讯、港口、机场、电力等目前已出现超前性的过剩，将特别国债集中投向于基础设施，不仅会导致重复建设和投资体制的复归，而且效率低下。二是产业带动效应不理想。政府所投的产业关联度不高，并对私人投资产业一种“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财政乘数作用难以发挥。三是就业功能值得怀疑。基本建设项目多属资金密集型，能够吸纳的就业有限。发达国家一般不太愿用财政政策，皆因财政政策效率低下是一个通病。

第四，从深层次看，由于经济出现“断层”，财政货币政策“失灵”不足为奇。利率调整等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尤其是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极其重要的灵敏的宏观调控手段。在信贷资源比较宽裕、存大于贷的情况下，由于中国银行商业化改革逐步深化，金融监管加强，银行将更多地考虑资产和贷款的质量，避免重蹈“八五”时期放任自流贷款的覆辙，金融机构自然“惜贷”。伴随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机制的强化，企业将更多地考虑还贷能力。由于转轨尚在进行，机制尚未完善，相互磨合的过程还未完成，“市场缺陷”和“反应时滞”相互叠加，产生对利率反应不够灵敏的现象。

综而观之，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方式，强化了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影响，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攀比速度”，这样做短期的增长目标可能达到了，但副作用不容低估。

（二）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慎防经济出现“滞胀”。根据经济成长规律，只有经过一定程度的振荡，经济发展才能重新恢复活力，并在调整中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从历史上看，各国工业化在几个产业升级期都发生过经济成长“断层危